

太平天國運動

范 文 瀾 著

目錄

引	言	一
一	太平革命準備時期	七
二	太平革命勝利時期	一八
	前期革命形勢——飛躍	一八
	後期革命形勢——停滯	二三
三	太平革命衰敗時期	四一
	前期革命形勢——防禦	四一
	後期革命形勢——破圍失敗	五三

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創造了世界市場。自從南京條約訂立，五口通商，中國以半殖民地資格，進入世界市場了。閉關時代，人民受封建剝削，已經極其痛苦，鴉片戰後，又加外來的資本主義剝削，這種新式剝削，破壞中國手工業，使數千年來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的社會機構開始在某些地區趨於瓦解，更嚴重的是促進滿清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猛烈增加封建剝削的強度，繁重得難以負擔的舊捐稅上，又加上新捐稅，填補賠款和鴉片貿易的虧額。鴉片戰後十年間，中國社會驟然遭遇這樣史無前例的大變動，不論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村，全部震盪起來，舊的財政、經濟、政治、禮教各種制度，愈更成為中國人民的禍害，新的人民的反封建革命運動，就在這樣時代條件之下是必然要發生了。而揭開這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就是馬克思稱為「處於社會革命底前夜」的太平革命。

那時，以英國為首（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四分之三）的外國侵略者與滿族皇帝為首的封建剝削者，給予人民最大的痛苦，試看下列事實，英國的鴉片、滿清的暴政，顯然是痛苦的源泉。

英國輸入紡織品價額表（單位千金鎊）：

	棉織品	毛織品
一八四二年	四七〇	一四六
一八四三年	六五五	四一七

一八四四年	一、四七五	五六五
一八四五年	一、六三六	五三九
一八四六年	一、〇二四	四三九
一八四七年	八五〇	三八九

一八四四年——四六年，輸入額增長，到四七年開始低落，此後十年，輸入額平均說來幾乎沒有變動。這說明英國布疋對中國紡織手工業起了破壞作用，但不是嚴重的。輸出方面，中國絲茶逐年增長，在中英合法貿易上總是佔優勢，足夠抵補布疋及其他商品的價值而有餘。英國對華經濟侵略，主要依靠可恥的鴉片貿易，從南京條約成立時起，鴉片貿易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大量輸入中國，每年換取等於數百萬金磅的銀兩出口。從一八四〇年——五〇年，英國輸入鴉片箱數如下

一八四〇年	二〇、六一九箱
一八四二年	三三、五〇八
一八四四年	二八、六六七
一八四六年	三四、〇七二
一八四八年	四六、〇〇〇
一八五〇年	五二、九二五

十年間鴉片輸入增加一倍以上，消費者主要是統治階級中人，他們行施各種搜刮方法，強迫人民償補耗失的銀兩，鴉片貿易繼續上漲，正與政治愈益腐朽，剝削愈益殘酷，銀源愈益枯竭，人民愈益困窮成平行線發展。當時全部政治機關兇暴貪污，比鴉片戰前更甚，連會國海那樣殘忍的漢奸，也不

能不認爲「百姓顛連窮苦」，舉出一些「民間疾苦」，勸告咸豐帝「務思所以更張之」了。照會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所說：第一是「銀價太昂，錢糧難納」——「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每石平均價三千文），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州鄉竭全力以催科，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扑滿堂，血肉狼藉。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拿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鎖其親戚，押其鄰里，真有日不聊生之勢」。這裏所謂小民，當然不是地主富農，這種人或與官吏勾結，朋比爲奸，或放高利貸，兼併土地，與其說受加賦之害，不如說受加賦之利，土地集中現象在鴉片戰後特別緊張，地主富農因中小農破產，經濟反趨繁榮，鴉片銷路也順利擴張了。那時候中小農民生活的窮困是難以形容的，例如江浙產米地區，米一石平均價值三千文。銀價在道光初年，每兩換錢千一二百文，道光十八年，換錢一千六百文，二十五年，京中換錢約二千文，外省換錢二千二百文，農民賣米所得，以錢折銀，實際減縮一半左右。官府徵收地丁，定價銀一兩，道光十九年，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後漸增至二千餘文以至二千八九百文，總比市價高數百文。農民完納地丁銀一兩，歷年遞增至需賣米一石，再加漕米折銀，每畝又需賣米數斗，平常年景，一畝產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完納地丁漕米，已經剩餘無幾，暫時拖欠就遭血肉狼藉的慘刑，破產更不可免，因此他們唯一的生計是壓縮自己的生活費，限於豆麥蠶桑……等副產範圍內，一遇天災疾病及其他意外事，副產不夠養生，當然成爲高利貸者的犧牲品。佃農僱農生活尤其惡劣，上等佃戶耕田二十畝，每畝所費種籽、肥料、牛具、農器、農忙幫工等約一千文，春季缺糧必需填補，一般向當地富戶借貸錢米，秋收時加倍償還。每畝產米不過二石，還田主租米二十石，還債主錢四十千，米十幾石，剩餘極微，經營副業，又需借入本錢，支付重息。

中下等佃戶負債更多，終身不能脫離高利貸的盤剝。僱農工資通常每年十千文，無力娶妻成家，依附僱主過奴隸生活，是農民中最苦的一級。因地主富農急速發展，中小農戶繼續破產失業，多數轉入僱農或流氓羣中，人口過剩成爲社會極嚴重的危機，只有革命才是出路。

第二是「盜賊太衆，良民難安」——「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迹，或反借盜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爲盜夥，火其居而械繫之。又或賣成族鄰，勒令縛盜來獻，直至縛解到縣，又復索收押之費，索轉解之資。故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卽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這裏所謂盜賊，實際正是飢民抗富戶，真正盜賊，都是全部行政機關，從官吏到兵役，無不「焚燒民房，訛索財物」，借口捕盜，實行燒殺搶奪，殘暴遠非普通盜賊可比。

第三是「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人民控告官長吏役，大率皆坐原告以虛誣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脫然無事，一家久訟，十家破產。往往有纖小之案，累年不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聞之髮指」。這裏所謂冤獄，實際就是法律保障貪污。統治階級的法律必需僞裝一些公正面目，才能欺騙人民，現在眞面目完全暴露，法律喪失信用，「令人髮指」的原因在此。

會國藩代表一部分缺乏政治勢力的有產者訴苦，社會極大多數窮民的冤苦，他是不理會的。但僅就這三條說來，滿清官僚政治的黑暗，農業生產的摧殘，足夠證明人民要求革命的正當了。他在「議汰兵疏」裏又說「兵伍之情狀，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滿清養綠營兵七十萬，八旗兵二十五萬，全國分駐一百萬武裝強盜，配合號稱官員吏役的文法強盜，共奉滿洲皇帝爲渠魁，一致向人民敲剝，悍然不顧。這樣兇惡的一具統治機器，止有對滿洲貴

族漢奸、地主、富農、外國侵略者有存在必要，從人民方面看，除了搗毀它，再沒有自救的道路。

中國人民反抗滿清，從來不會停止，鴉片戰爭前後，南北各省反滿秘密結社，非常發達。被統治階級發覺的已經是名號繁多，實際並不止這些。例如咸豐元年七月戊子上諭「近來四川之囑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東安徽匪徒，結黨成羣，幾於所在多有」。事實上捻黨散佈河南安徽山東一帶，爲北方白蓮教天理教兩次大起義以後新起的大勢力，齋教散佈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一帶，爲兩宋麗教（北宋末麗教主方臘起義）的流派，都不是僅限於一省。勢力尤大的天地會（又稱洪門、三合、三點），分長房福建、二房廣東、三房廣西、四房兩湖、五房浙江，會員布滿南中國，以「反清復明」爲共同宗旨。其他小派別，單是湖南一省就有串子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紅黑會、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各省秘密結社大致相類，這種散漫小規模的結社，不論它思想如何愚昧，方法如何落後，本質是窮苦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一個力量。從鴉片戰爭起，大小會社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發動武裝起義，較著稱的有如下列：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陽縣人鍾人杰聚衆數千人起義，自稱鍾勒王，並豎都督大元帥紅旗，次年戰敗被殺。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岡州人曾如炷起義。

一八四四年——臺灣嘉義縣人洪協等起義。湖南耒陽縣人楊大鵬等聚衆抗糧起義。

一八四五年——清山東巡撫發兵捕殺捻黨。

一八四六年——雲南永昌同民起義。湖南新田縣人王宗獻起義。江蘇昭文縣人金得順等起義。

一八四七年——天地會首領雷再浩、李世得等起義，進攻全州，湖南廣西天地會員籌備響應。

一八四八年——清廷諭兩廣、湖南、江西各督撫嚴拏天地會員。

一八四九年——廣西大饑，鄉村間饑民千百成羣，向富戶借貸錢米。富戶辦團練，藉口保全身家，請州縣官出示，特准對饑民「格殺勿論」。統治階級的殘忍性完全暴露，天地會和饑民紛紛起義。揭「官逼民變」、「天厭滿清」、「朱明再興」、「替天行道」、「救富救貧」等旗號，攻佔城市，誅戮官吏，聲勢大振。廣西一省起義軍多至數十部，每部有衆數百人以至數千人，其中大部如湖南新寧縣天地會首領李元發，佔據廣西、湖南、貴州三省邊境，三省天地會起兵響應，元發遭清兵圍攻，戰敗被殺。又廣西貴縣盜魁張嘉祥（降清後改名張國樑），迎合飢民心理，提出「上等的人欠我錢，中等的人得覺眠，下等的人跟我去，好過租牛耕瘦田」四句口號，大得貧苦人擁護，在各部中兵力最強。不久張嘉祥戰敗，投降清軍，成太平天國的勁敵。當時清兵腐朽不能作戰，止是利用天地山會堂分立，缺乏統一指揮，盜魁貪得小利，並無政治思想等間隙，居然收各個擊破、壓平反抗者、賄買反革命走狗的功效。可是太平革命軍與其他起義軍不同，它有堅強的軍事組織、統一的宗教信仰、顯明的政治綱領、強烈的民族意識，繼各部起義軍失敗之後，衝破清兵包圍，展開偉大場面，這決不是偶然的。

一 太平革命準備時期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商品、基督教、大砲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整套工具。基督教裝着偽善的面貌來掩護掠奪政策，開大砲屠殺是侵略者的另一面貌，總目的在暢銷商品，主要是鴉片。馬克思說「歷史之所以需要麻醉中國人民，爲的是要把他們從歷來的愚昧狀態中喚醒起來」。的確，鴉片使中國統治階級愈益腐爛，對中國人民却「不會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太平運動採用基督教某些教義作爲反封建思想的根據，這也是因鴉片而驚醒的一種表現。

一八〇七年（嘉慶十二年），英國傳道會派遣瑪禮遜博士到廣州傳教，譯耶教聖經成華文。他的第一信徒梁亞發著一種傳道書叫做「勸世良言」，在路上分發宣講。一八三七年，洪秀全到廣州應秀才考試，無意中得「勸世良言」。秀全是天資聰明，熟讀經史很有才學的青年士人（二十五歲），他在科場屢次失意，激起反抗思想，試罷歸家，裝瘋病四十餘日，說自己上天堂受了上帝的天命。這是歷史上「符瑞」「受命」的舊方法，與魔教拜日月神白蓮教拜彌勒佛，同一意義，只用作號召民衆的旗幟。秀全病中吟詩有「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投地網，收殘奸軌落天羅」等句，純屬政治性質，並無顯著的宗教色彩，洪秀全與基督教的第一步關係僅利用上帝耶穌兩個名詞宣稱自己受了天命。

一八三八年、四三年，秀全兩次應試，又遭失敗。那時候滿清政治軍事的全部能力在鴉片戰爭中完全暴露，他決心拋棄科舉，實行起義準備。他和同窗馮雲山等研究勸世良言，附會書中詞句，證明本人確實接受了上帝耶穌的天命，他創立上帝教，勸人在上帝面前悔罪，不事邪神，不行惡事，遵守天條。秀全雲山都是貧苦塾師，他們不顧失業的困難，把孔子牌位毀棄，結果學童驚散，書館停閉，不得不離開花縣本鄉，遠赴廣西傳教。封建社會的「至聖」孔子竟被看作邪神，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

一八四四年，秀全雲山到廣西貴縣傳上帝教，農民百餘人受洗禮入教。一八四五年，雲山轉入桂平縣紫荊山向曠工宣傳，秀全回花縣製造傳教文書。原來上帝教只有一些簡單教義，主要是不拜偶像邪神，獨拜真神上帝，信奉耶穌，可得天堂永久快樂。這種教義不能號召廣大羣衆，需要理論的補充，秀全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論兩篇，確掌握了窮苦人民的心理，初步發動反抗的熱情。救世歌勸人要作正人，切戒「淫」、「忤父母」、「行殺害」、「爲盜賊」、「爲巫覡」、「賭博」，六個不正行爲。他在戒條裏輸入政治上的平等思想，說「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主私自專？上帝當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視之皆赤子」。天子的稱號和祭天的特權，一向歸皇帝獨佔，人民是皇帝的奴隸臣妾，「僭」號「侵」權便是大逆不道。人民都自稱天子，都有權拜自己的天父，恰恰破壞了封建制度的等級精神。因爲人人都是兄弟，殘虐成性的統治階級自然是「嗜殺人民爲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人民殺草寇完全是正義，戰爭所引起的禍災完全是草寇的罪惡。

醒世論裏又灌輸經濟上的平等思想。他根據「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這個原則，說「天下（世界）多男人，盡皆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輩，何得存此疆域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併

之念」。顯然，那些滿洲人、官吏、地主、高利貸者剝削吞併，都是反「上帝之真道」的妖魔，必需殺逐，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變凌奪鬥殺之世爲公平正直之世」。他引述孔丘「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謂大同」一段話，想實現「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上德」的太平世界。這種主觀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稱爲「中國的社會主義」）要求，根據無貧富之分的新原則重新分配財產，製定天朝田畝制度。當馬克思在歐洲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時候，洪秀全提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雖然是空想，却顯示出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氣魄。

政治上經濟上兩大平等，是在封建壓迫之下困苦不堪的廣大人民主要是農民迫切要求，也是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救世醒世兩篇論文，剝去它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民主主義思想的本質，太平革命運動就在這個平等思想推動之下壯大起來。

「太平天國起義記」載當時秀全對族弟洪仁玕的秘密談話說：

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爲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耶？

又說：如果上帝助吾恢復祖國，我當教各國各自保管自有之產業，而不侵害別人所有，我們將要彼此有交誼，互通真理及知識，而各以禮相接，這是我心中之大願也。

這是秀全的民族平等思想，一八四六年，秀全依據這個思想作原道覺世訓，覺世訓是指出戰鬥目標的論文，它反覆說明「閻羅妖乃是老蛇妖鬼也，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所謂閻羅妖，實際就是人間的滿洲皇帝，文中所謂「閻羅妖之妖徒鬼卒」的各種偶像，就是人間的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賊。統治者口口聲聲責備人民「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應該感戴皇恩，覺世訓却說皇

上帝造天地萬物，保佑人有衣有食，人明明沾皇上帝的恩典。那些邪魔敢冒天恩，該誅該滅，那些感戴邪魔恩典的人是「良心死盡，大瞞天恩，究與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他把上帝與閻羅妖對立，勸告人民脫離妖魔的迷惑，獨拜真神皇上帝。又把皇上帝與人民間皇帝對立，認為「他是何人，敢視然稱帝，妄自尊大」。在迷信神權王權的社會裏，給人民一種勇氣敢於反對偶像閻羅妖及皇帝，不管勇氣的來源出於宗教迷信，到底起着革命的作用，就宗教說，一神教比多神教拜物教也是大進一步。醒世，救世，覺世三篇的製成，奠定了太平革命的理論基礎。後來同盟會倡導三民主義，遠源也是這三篇。

一八四七年，秀全離花縣到廣州禮拜堂從美國牧師羅孝全學耶穌教義，得讀新舊約聖經。他學了些對上帝禮拜的儀式，就去廣西尋馮雲山，在紫荆山設立上帝會機關，共同製定上帝教各種儀式及十條天條。它把人生日常動作，都表現為一種宗教儀式與上帝聯繫起來，教徒集會禮拜有讚美上帝詩，入教受法有悔罪奏章，朝起夜睡有拜上帝祈禱文，吃飯有感謝文，其他如災病、喜慶、喪葬、生日、滿月、迎親、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動土等事，都有祭告上帝奏章。禱文大意不外「祝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誅滅妖魔，萬事勝意」，「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福」一類免禍得福的願望。統治階級中各個等級都有權壓迫人民，因之幻化為各種偶像鬼神都有權血食，上帝教集中禍福大權在一個皇上帝，也就是只承認一個人民自己的權力，這些迷信瑣碎的儀式，却成為組織革命羣衆的重要方法。

十條天條模倣摩西十誡，前四條屬宗教信仰，後六條即救世歌所舉六不正的條文規定，在平時當作教徒的生活法則，戰時變為軍事紀律（上帝教徒死後不用棺木，只用布帛裹屍體，也是為戰爭便

利）天條比禱告儀式有更大的組織作用。

上帝教具備了理論和組織，派人四出宣傳，教徒人數大增。秀全與雲山等寫奏章祈禱上帝，秘密蓄髮，選擇紫荊山險固地方作根據地，聚集會衆準備起義。爲要鼓勵會衆的誅妖勇氣，秀全率馮雲山等往象州搗毀甘王廟。甘王是殺母、貪暴淫亂的著名鬼神，象州人怕它作怪降禍，祭祀非常虔敬。秀全入廟宣布甘王十大罪狀，舉大竹杖擊毀神像。從此秀全威名大振，入教人愈衆。上帝教徒到處破壞廟宇偶像，宗教信仰轉成宗教鬥爭。地方紳士認爲拜會謀叛，起團練擒獲雲山等送桂平縣獄，會衆籌集數百串錢營救雲山出獄，宗教鬥爭轉成政治鬥爭。一八四七年，上帝教起義準備初步完成了。四八年至五〇年，上帝教與團練鬥爭愈益尖銳，起義準備成熟而爆發了。

一八四三年秀全創教，四四年到廣西傳教，四五年製造宣傳論文，四七年定組織規章，建立起義根據地，開始革命行動，前後五年，上帝教竟成有實力的革命團體。五〇年起義前，以桂平縣紫荊山爲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南到博白、陸川，北到武宣、象州，在黔甌兩江流域的村落和山嶺裏，都散播了上帝會的種子。這樣迅速的發展，主要由於滿清統治腐爛不堪，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主觀方面利用宗教迷信推行平等思想與組織，配合了客觀的革命要求。

一八四八年以後，上帝教與地主武裝團練進行着激烈的鬥爭，正如李秀成自傳所說「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在鬥爭發展中，洪秀全馮雲山二人組成的領導核心當然需要擴大，陸續加入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四人，最後加入洪大全，成立七個人的領導集團。這個集團的結合與分裂，決定太平革命的勝利與失敗，這裏就必需敘述七人的階級成分及簡史。

洪秀全——廣東花縣客家人。中農家庭，父兄耕田謀生，家境窮困。秀全七歲（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入塾讀書，聰明異常，五六年間，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多篇，父兄和親族都希望他科舉成名。十六歲因家貧失學，助父兄耕田。十八歲（一八三〇年）受聘爲本村塾師；直到三十一歲（一八四三年）創立上帝教以前，不會離開村塾教師的職業。一個讀經史多年，功名心極重，屢次應試得不到秀才的失意人，悲憤不平，在鴉片戰爭後，走向革命道路是很自然的。他的學問知識可以創教作教主，但實際傳教的是馮雲山。領導羣衆的是楊秀清，教主與教徒中間隔着一個媒介體，這使他脫出簡單的塾師生活，又進入高高在上的教主生活，不能積累起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去實際領導太平革命。

馮雲山——花縣客家人，與秀全同窗，也同是有才學考試失意的窮苦塾師。秀全創教，雲山首先受洗。一八四四年，二人到廣西貴縣傳教。不久，秀全歸家製造宣傳論文。雲山留桂平紫荆山，親身挑泥挖土，充當苦工，向附近各山燒炭工人，礦工及農民宣傳新教。到四七年秀全回紫荆山時，信徒已有數千人，造成雄厚勢力，號稱「拜上帝會」。二人共訂宗教儀式及天條，開始作起義準備。雲山被團練捕獲押入縣獄，秀全回廣州設法營救，楊秀清等燒炭工人等集錢數百串充賄賂，四八年初，雲山得釋放歸山。教徒人人歡欣，即時殺牛宰馬，獻祭上帝，感謝天恩。雲山出獄後往花縣尋秀全，四九年六月才同行歸山。他是上帝會主持者，離會一年以上，不曾指定代理人，會衆無人統率，發生分裂現象，這是極可惋惜的。

三 楊秀清——桂平縣平隘山客家人。世代以燒炭種山爲業。秀清幼年喪父母，曾離家流蕩，五口通商前，結夥伴護送洋貨，交結許多兩廣江湖上豪客。上海開埠，廣州國際貿易衰落，秀清失業歸家，

仍作燒炭工人，他「識字無多，奸譎異常」（「賊情彙纂」），所謂「奸譎」，就是他的閱歷和智謀高出一般人。馮雲山出獄回花縣，會衆發生動搖，楊秀清自稱上帝附身顯聖，發布號令，團結會衆。這在當時也還是必要的手段，秀全回來，不得不追認聖言，從此代上帝傳言的大權專屬秀清，洪、馮都是廣東籍，不及秀清與羣衆有鄉土關係，再加上帝附身，秀全要跪地聽命，甚至受杖責，秀清權力在羣衆中提高到第二教主的地位。馮雲山不幸早殺，秀清掌握軍事政治權全部及宗教權半部，秀全權不稱位，潛伏着後來楊韋內訌的禍根。

蕭朝貴——武宣縣農民，破產流落，糾合勇士入山，護送往來商客，與楊秀清結識，約爲義兄弟。廣州商業轉移上海，楊，蕭失業，同入上帝會成羣衆首領。秀清稱上帝附身，朝貴稱耶穌附身，後來都被洪秀全承認有代言權。秀清多智謀，朝貴忠實坦率，勇敢剛強，衝鋒第一，代表農民的革命性。楊、蕭關係較深，秀全妹宜嬌嫁給朝貴，增強洪、楊兩方的結合。朝貴在攻長沙時戰死，與馮雲山早死同是重大的損失。

韋昌輝——桂平縣金田村人，地主兼典當商，爲一縣首富，捐得監生名目，出入衙門辦事，又是豪紳身分。一八四九年，廣西飢民發動分糧，富戶多破家，昌輝獨能慷慨施予，得本縣一部分民衆擁護。上帝會勸昌輝入會，借他的紳富名義和資財，組織保良攻匪會，掩護革命活動。他出身剝削階級，貪污官吏指爲謀反，被迫參加金田起義，在太平軍領導集團中是唯一壞分子，後來楊韋內訌，大局敗壞，他是主要負責者。

石達開——貴縣北山里客家人。石家是當地土豪大姓，人口多，富有財產。達開讀書有才志，文武備足，加入保良攻匪會，同謀革命。韋、石二人都是當地多年紳富，各擁有一部分羣衆，他們對上

帝會關係較淺，在領導集團中地位也較低，因之達開雖是第一等軍事政治人才，却不能取得洪、楊的絕對信任。

洪大全——湖南衡山縣人。他在供詞裏自述「自幼讀書作文，屢次應試，考官不識我文字，屈我的才，就當和尚。還俗後，又考一次，仍未取進。我心中忿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天下地圖，都在我掌中，古來戰陣兵法，也都留心。」他和洪秀全一樣，應試失意，轉向革命。秀全接觸一些西洋文化，創造平等思想的上帝教，大全生長在內地，只能組織舊形式的天地會，自然，上帝會是有前途的。可是天地會勢力浩大，大全遊行兩廣兩湖各地，結識山堂首領，擁有廣泛的羣衆。上帝會是新起的，一個地區的團體，羣衆基礎遠不及天地會。金田起義後，大全以天地會大首領軍事專家資格前來合作，上帝會推尊他爲天德王，居次於洪秀全的地位，是有政治意義的適宜處置。洪大全的真姓名是焦大，參加起義後，改稱萬大洪。「朱」、「洪」、「萬」都是天地會的貴姓，（天地會員尊奉萬雲龍爲開山始祖），他對天地會用萬大洪姓名，爲的便於號召會黨，對上帝會又用洪大全姓名，表示與洪秀全有兄弟對等的關係。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國二年咸豐二年）萬大洪在永安圍城中，用「天德」年號頒發告示，對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人民號召「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救民於水火之中」，全篇不見一句宗教語，與上帝會開口必稱天父天兄顯然不同，太平天國用陽曆，天德仍用陰曆（但承認太平曆），太平天國領導人稱王，萬大洪自稱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又有都督大元帥稱號），不受天德王名義。天地會沿用「天德」二字以爲理想中小主的年號（起於康熙時張念一奉朱三太子起義），非朱姓的起義人多自稱大元帥（如一八五〇年廣州發現天德二年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萬大洪即洪大全，是天地會首領毫無疑問。他承認「奉天承運太平天國」，洪秀全討清詔書

裏，也自認「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在復明反滿一點上，天地上帝二會是可以合作的。

以上七人，從團結方面說，在太平天國名義下，一致反對滿清統治者，農民、手工工人、運輸工人、會黨、流氓、以及一部分失意的士人、被欺壓的地主商人，都有代表參加了這個領導集團，形成龐大無比的革命聲勢。滿清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在永安戰敗後，感到「此賊不是尋常的賊，總願旁人不要同我一樣才好」，這就是團結所表現的威力。但從紛歧方面說，首先是上帝天地二會存在着裂痕。上帝會崇拜一個真神，楊秀清代真神發言，因之楊秀清等於真神。天地會標「反清復明」為宗旨，並非宗教團體，洪大全在自述裏說「妖術行為，古來從無成事的」，他不能聽從楊秀清指揮，可以推見。其次是上帝教本身，洪馮為一組，楊蕭又為一組，洪馮創教，楊蕭代上帝耶穌發言，宗教領導二元化，隱藏着分裂的嚴重危機。章石實際上並非上帝教信徒，章被迫參加，石「讀書有大志」在一定時機下，章可以爭權內亂，石可以負氣獨立，簡單的宗教迷信是不能束縛他們的。洪馮蕭三人早死，洪楊章石四人間紛歧的因素繼續發展到分裂，蓬勃的太平天國也就由衰弱而至於崩潰了。

太平革命的基本羣衆，在金田起義時，一般是廣西人、客家人、上帝會人（教徒總數約三千人）。按職業區別，有下列二類。

第一類羣衆：

燒炭工人——上帝會主幹之一，首領楊秀清，肅朝貴。上帝會人數數燒炭為業，俗稱為炭黨，集中地在桂平縣平隘山。

礦工——道光年間，貴縣招集客家人開掘銀礦，馮雲山入北山里龍山中，宣傳上帝教，成為上帝